

王运熙 顾易生 主编

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

（下册）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复旦博学

博學



文学史系列

王运熙 顾易生 主编

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

(下册)

顾易生题



复旦大学出版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博學



复旦博学·文学史系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王运熙,顾易生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1

ISBN 7-309-02939-9

I. 中… II. ①王…②顾… III. 文学批评史-中国
IV. I20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48423号

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

王运熙 顾易生 主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韩结根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63

字数 1065千

版次 2006年9月第一版第四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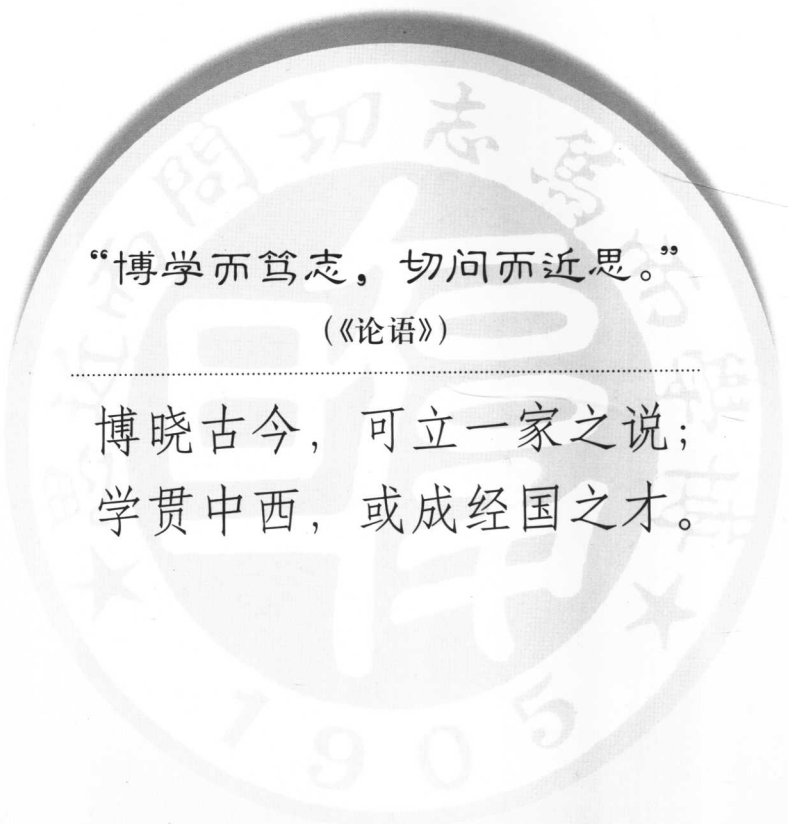
印数 16 101—18 200

书号 ISBN 7-309-02939-9/I·200

定价 88.00元(全二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 large, faint watermark of the Fudan University logo is centered on the page. The logo is circular and contains the Chinese characters '復旦大學' (Fudan University) in the center, with '1905' at the bottom. The text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 is superimposed on the logo.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论语》)

博晓古今，可立一家之说；
学贯中西，或成经国之才。

作者简介

王运熙，男，1926年6月生。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合作主编并参加其中《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的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合作主编并参加撰写）、《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中国古代文论管窥》、《文心雕龙探索》、《乐府诗述论》、《望海楼笔记》、《当代学者自选文库·王运熙卷》、《李白诗选》、《李白研究》等。

顾易生，男，1924年12月生。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合作主编并参加其中《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宋金元文学批评史》的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合作主编并参加撰写）、《柳宗元》、《诗词助读》、《宋词精华》、《十大散文家》等。

袁震宇，男，1928年6月生。复旦大学教授。著有《明代文学批评史》（合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合著）、《宋词精华》等。

黄霖，男，1942年6月生。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近代文学批评史》、《古小说论概观》、《金瓶梅考论》、《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合著）、《原人论》（合著）等。

杨明，男，1942年11月生。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合著）、《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合著）、《刘勰评传（附钟嵘评传）》、《南朝诗魂》、《文赋诗品译注》等。

邬国平，男，1954年10月生。复旦大学副教授。著有《清代文学批评史》（合著）、《清代文论选》（合著）、《中国文论选·近代卷》（合著）等。

内 容 提 要

本书依照历史发展顺序，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代前中期、近代七编，说明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过程。全书内容系统，对于诗文、小说、戏剧各文学领域的理论批评，对于历代比较重要的批评家及其论著，均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本书在撰写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观点稳妥，叙述平实；同时注意吸收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在一些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看法，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目 录 下 册

第五编 明 代

绪 论	3
第一章 明代的诗文批评	11
第一节 明初的诗文批评	11
第二节 李梦阳、何景明(附徐祯卿)	24
第三节 李攀龙、王世贞及其他	31
第四节 唐宋派	40
第五节 公安派与竟陵派	48
第六节 陈子龙与艾南英	65
第二章 明代的戏曲批评	73
第一节 明初的戏曲批评	73
第二节 嘉靖、隆庆时期的戏曲批评	80
第三节 吴江派与临川派的论争	93
第四节 王骥德和晚明其他戏曲批评家	117
第三章 明代的小说批评	132
第一节 历史小说论	132
第二节 吴承恩及谢肇淛	142
第三节 李贽与叶昼	147
第四节 有关《金瓶梅》的批评	161
第五节 冯梦龙及其他	167

第六编 清代前中期

绪 论	179
-----	-----

第一章 明清之际的文学思想·····	189
第一节 钱谦益、吴伟业、冯舒和冯班·····	189
第二节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198
第三节 侯方域、魏禧(附廖燕)、汪琬·····	210
第二章 清代前中期文论·····	219
第一节 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	219
第二节 汉学家的文论、章学诚《文史通义》·····	233
第三节 阳湖派·····	245
第四节 阮元与清代骈文理论·····	248
第三章 清代前中期诗论·····	255
第一节 王士禛·····	255
第二节 叶燮《原诗》·····	260
第三节 沈德潜·····	265
第四节 宋诗派及厉鹗·····	270
第五节 袁枚·····	274
第六节 翁方纲·····	279
第四章 清代前中期词论·····	284
第一节 陈维崧及阳羨派·····	284
第二节 朱彝尊及浙西派·····	289
第三节 张惠言、周济及常州词派·····	294
第五章 清代前中期戏曲批评·····	303
第一节 金人瑞的戏曲批点和清初的曲论·····	303
第二节 李渔·····	314
第三节 洪升和孔尚任(附刘廷玑、吴仪一)·····	327
第四节 地方戏繁盛时期的戏曲理论批评·····	338
第六章 清代前中期小说批评·····	350
第一节 金人瑞·····	350
第二节 毛纶、毛宗岗父子与张道深·····	360
第三节 蒲松龄、纪昀与有关《聊斋志异》的评论·····	367
第四节 曹雪芹、脂砚斋及其他·····	372
第五节 “卧本”《儒林外史》的评点·····	381

第七编 近 代

绪 论·····	389
第一章 近代的诗文批评与词论·····	403
第一节 龚自珍、魏源及其他·····	403
第二节 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及洪仁玕·····	415
第三节 梅曾亮、方东树、姚莹、曾国藩等桐城派与何绍基、陈衍等宋诗派·····	421
第四节 梁启超、黄遵宪等“诗界革命”与裘廷梁的白话文体论·····	438
第五节 章炳麟、南社等资产阶级革命派文论·····	457
第六节 刘熙载、谭献、陈廷焯等词论及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470
第二章 近代戏曲理论批评的发展和演变·····	486
第一节 19世纪的戏曲理论批评·····	486
第二节 梁启超、姚华的戏曲理论批评·····	490
第三节 王国维的戏曲理论·····	496
第四节 《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和吴梅的戏曲理论批评·····	504
第三章 近代的小说理论批评·····	513
第一节 梁启超与“小说界革命”·····	513
第二节 吴沃尧·····	527
第三节 徐念慈与黄世仲弟兄·····	533
第四节 王国维与王钟麒、黄人的中国古典小说论·····	546
第五节 林纾的翻译小说理论·····	557
第六节 管达如的《说小说》和吕思勉的《小说丛话》·····	560

第五编 明 代

绪 论

明代的文学,小说戏曲高度繁荣,诗文则相对说来较少创造性;然而诗文理论批评却相当繁荣,自有其特点。随着封建社会进入后期,市民阶层的兴起,社会矛盾的尖锐复杂,新旧思想的冲突,时代的演变,形成各种诗人流派,旗帜鲜明,或主复古,或尚新变,反复论争,相当激烈。它们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提供的经验与教训,是颇有可以作为后人借鉴之处的。

明代前期诗文批评与台阁体

在元蒙的奴役统治被推翻与统一的明帝国建立后,社会经济有了复兴与进一步发展,朱明王朝确立了高度的中央集权,采取八股取士、提倡程朱理学等措施巩固其统治,严密钳制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这些情况,对于文学批评与创作发生严重的影响。

宋濂为“开国文人之首”,他提倡文章应该明道致用为维护“三纲六纪”服务;取径欧阳修、韩愈以溯源《六经》,正是符合新王朝整饬封建秩序要求的。高启论诗主张广泛模拟前代各家的长处,林鸿、高棅则专崇盛唐,都已透露出复古的端倪。值得注意的是,宋濂对杨维禎的崇扬中表现某种异端倾向,刘基早期诗论的强调诗歌讽刺政治、批判现实的作用,高启自叙其诗时显示的诗人自觉意识。方孝孺赞美庄周、李白、苏轼等作品的浪漫神采,但他所谓“文之为用,明道立政”等基本观点,与其师宋濂是一脉相承的。

从永乐以至成化、弘治(1403—1505)一百年间,随着帝国的巩固、专制统治的加强,文坛上出现了平庸芜弱、粉饰太平的台阁体和“专作理语”的性气诗。这正是当时统治阶级有意识提倡以及知识分子处在专制压迫下和比较安定的环境中精神萎靡的产物。明初一些著名作者,包括宋濂、刘基、高启、方孝孺,在封建政权的强化与统治阶层内部纷争的过程中或贬或死,已

足见人们所受政治压力的严重。台阁体的领袖人物“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都是朝廷大臣，他们秉承皇帝的意图，专摹欧阳修散文中平舒柔婉的风格，推崇唐诗而着眼于“以其和平易直之心，发为治世之音”（杨士奇《玉雪斋诗集序》）。这样上行下效，使诗文都患上了严重的贫血症。台阁体的后期人物李东阳，力主规模唐诗格调，开复古文学运动的先河。

前后七子的复古诗文理论与唐宋派

明代中叶以后，权奸当道，民间不断爆发反抗活动。有些知识分子，对黑暗的政局、萎弱的士风、腐滥的文风也越来越感到不满而试求改弦更张。弘治、正德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高唱“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渊奥文辞和高古格调相互标榜，打倒了数十年来风行的台阁体，也有力地批判了理学者流的性气诗，是有其功绩的。但他们片面地强调一切文学都是越古越好，全盘否定东汉以后的散文、魏晋以后的古诗和盛唐以后的近体诗。李梦阳公然声称要像临摹古人字帖一样模拟古代诗文，何景明倡言“古文之法亡于韩（愈）”、“古诗之法亡于谢（灵运）”，这就违反了文学的时代性和发展规律。李梦阳曾精辟地指出“诗发乎情”、“情动乎遇”，但其墨守成规的“尺寸古法”必然给所谓“以我之情，述今之事”以形式桎梏。嘉靖、万历年间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重复了这一复古以至拟古路线，造成相当声势，更导致模拟剽窃的流弊。前后七子的观点中，也存在多种因素，而且是有变化和分歧的。何景明对李梦阳的“刻意古范”提出过批评，而主张“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不仿形迹”。李梦阳既重视真情，后期更彻悟到“真诗果在民间”，而自谴其诗是“出之情寡而工之词多者也”。王世贞晚年对自己前期论点曾有所追悔，发表了一些比较折衷的言论。此外，如徐祯卿的“因情立格”说，明确肯定情与格的主从关系，识见更出李梦阳之上；谢榛的分析诗歌创作艺术特征，也有自己的会心；屠隆的论“虚”、“实”关系，则接触到了文学的浪漫与写实两种创作方法精神的不同特点以及相互结合的问题。

在前后七子之间，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的唐宋派，继承宋濂取径韩、欧之说，提倡学习“唐宋八家”散文的神理和平易自然的风格语言，与“文必秦汉”之说相峙。在嘉靖初期造成过一定声势，但他们的“变秦汉为欧（阳修）曾（巩）”，又使文风趋弱。唐顺之提出的“本色”论，主张文章应该“直据胸臆”，有“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在他对先秦诸子学说与陶渊明诗

发表中肯见解之后,给予才气较差的曾巩文甚至迂腐俗滥的邵雍诗以最高评价,便突现其理论中的落后倾向,何况他几乎否定了艺术形式的作用。因之嘉靖后期后七子重振秦汉旗鼓,迅即取得压倒优势。唐宋派的影响却是深远的。明末清初一些重要批评家与作家,如艾南英、钱谦益、黄宗羲、侯方域、魏禧以至清代散文主要流派桐城派等,在不同程度上承受他们的意见。

公安、竟陵的“性灵”等说与陈子龙的忧时托志诗论

公安派产生于明代后期。那时城市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它和封建统治之间的矛盾也更尖锐起来。在新的社会矛盾和市民思想影响下,产生了反抗传统、追求个性自由解放的新思潮。王阳明学派的异端泰州学派,大胆肯定人们的生活欲望,破除对古代圣人的偶像迷信,对封建教义的不少方面作了批判。李贽是该派后期的杰出代表,而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及其兄宗道、弟中道等都是深受李贽影响的。当这新的思潮反映到文学领域去时,更形成了新的文学流派。

公安派以“变”和“真”的观点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等口号,猛烈地涤荡着拟古诗文风习。他们强调文学的时代性和个性化,指出文学和语言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创作具有真情实感,使用当时语言,有独创精神,反对陈规旧套,反对虚伪矫饰,反对因袭摹仿和盲目崇拜古人,也反对诗的流为理学、歌诀与偈诵。这些都是有进步意义的,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作者的思想束缚,给传统的文艺领域的陈腐教条以有力冲击。当然袁氏兄弟的推重真诗与民歌,也显然受有李梦阳诗论的启示。公安派的理论也有消极一面。他们崇尚“变”,以至把八股文也作为新事物加以肯定;所谓“真”,也缺少对创作与社会现实关系的推究。他们的部分言论又过分地漠视文学的继承性和创作的严肃性,特别由于不满现实而流露的颓废情绪和对适世情趣的追求,给人们以不良影响。袁中道后期也企图对公安末流的“为俚俗,为纤巧,为莽荡”的弊病有所纠正,然其以前的创新意气也有所衰退了。

钟惺、谭元春领导的竟陵派继公安派而起,其文学观点基本上继承公安派,既反对前后七子所导致的形式拟古之弊,也试图矫正公安末流轻佻浅率的偏失。他们思想中也有反封建火花,由于愤世嫉俗而提倡幽深孤峭的风格,“求古人真诗之所在”,“求古人真有性灵之言”,即是想把求真与学古、性

情与品格结合起来。其诗评中自有真知灼见,产生过很大影响,而取径僻狭也导致文坛偏弊。于是在崇祯年间,就有艾南英等重振唐宋派颓波,陈子龙等复燃前后七子余烬。艾、陈之间曾经发生过一场争论,双方把两派的理论更系统化了。然而,这时明朝的覆亡已迫在眉睫,朝政的极端黑暗紊乱,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民族斗争的风狂雨骤,有识之士自然不再自囿于宗奉唐宋或秦汉的窠臼里竞优较劣了。陈子龙后来就突破形式拟古的樊篱和温柔敦厚的传统教条,发扬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精神,强调文学抒写爱国忧时的怀抱与讥刺时事的作用,注重“情与境会”,即作者真情与现实环境密切联系,唱出时代的强音,为明代诗文批评史涂上灿烂的斜辉。

戏曲批评的发展和繁荣

在中国戏曲批评发展史上,明代的戏曲批评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踵武宋元,又密切结合当代戏曲创作和演出,论家辈出,著作林立,从朱权的《太和正音谱》到王骥德的《曲律》,标志着中国曲论已进入到一个空前的发展、繁荣时期,这个时期大略可以区分为明代初年、嘉靖隆庆和晚明三个阶段。

朱权的《太和正音谱》是明王朝建国时期最早出现的曲论专著。作者喜好戏曲,称戏曲为“太平之胜事”,并希望戏曲成为替新王朝“粉饰太平”的一种事业。这种主张,反映出明王朝建立者朱元璋“为君用”、“达时务”文艺思想的政治倾向。朱权重视音律,注重演唱,追求典雅华美的语言风格,对剧本的重要性已有比较明确的认识。此时,剧作家高则诚在《琵琶记》剧本中提出的“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共妻贤”等创作思想,也符合了新朝的政治需要。朱权、高则诚的上述主张,在明代初年的戏剧论坛占着支配地位。这一阶段,还有由元人明的贾仲明和无名氏的《续录鬼簿》,对元钟嗣成的《录鬼簿》作了一些补充,也有其理论批评意义。

嘉靖、隆庆年间戏曲批评,在经历了近百年的平静沉寂后,又逐渐适应创作演出的需要而活跃起来。李开先、何良俊、王世贞、徐渭、李卓吾等,先后著书立说,作出贡献。李开先注意民间通俗文学中的“真诗”和“真情”,贬斥缺乏真情实感、专事雕章琢句的创作倾向,提倡发扬元曲“本色”美的优良传统。李开先认为剧作家的责任在于“激劝人心,感移风化”,使观众有所裨

益。他总结元曲的发展,认为是与当时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在政治上遭受蒙古贵族歧视,多作“不平之鸣”,以及所谓的“衣食足而歌咏作”现象有密切关联。何良俊关于“《西厢》全带脂粉,《琵琶》专弄学问,其本色语少”的论断,标新立异,引起了批评界广泛而热烈的反响,其理论意义在于明确主张戏曲语言必须接近剧场广大观众。何良俊关于音韵格律的见解,后来被吴江派沈璟奉为圭臬。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论曲侧重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提倡按照作品主要倾向作评价的批评方法,反对“执末以议本”,主次不分的批评。徐渭的《南词叙录》,是我国第一部南戏专论。徐渭竭力反对一般文人鄙视南戏的恶习,认为作为戏曲之一种的南戏自有其存在和发展的权利。他指责《香囊记》一类作品,生搬《诗经》、杜甫诗句的恶劣影响,说“南戏之厄,莫盛于今”!他主张“曲本取于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乃为得体”。他把戏曲中的“本色”问题与创作中的“真实”问题联系起来讨论:“本色,犹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他的“贱相色,贵本色”论,具有独创的意义。徐渭注意戏曲的舞台搬演特点,要求作者注意曲与白之间的“谐和”、“可听”。思想家李卓吾从文学史发展的角度批驳了鄙视戏曲以为不足道的错误观点,认为优秀的戏曲、小说与诗文一样,都可以成为“天下之至文”。他以天然本色为曲之最上乘,总能高出人工雕琢一筹;主张创作离不开激情,厌弃无病呻吟。李卓吾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并联系作者之为人加以评价,颇具特色,但间或有离开作品艺术形象作任意发挥之弊。

第三阶段,自万历朝到明亡,戏曲批评空前活跃,论家辈出,著作众多,质量提高,自成体系,依附于剧本的评点式评论特别盛行。临川派和吴江派的评论家都对曲坛现状不满,意欲有所变革。由于对创作中存在问题孰主孰次的认识不同,改革的着眼点不同,以及作家的思想、个性、艺术观、创作方法的不同,两派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分歧,进行了热烈而持久的论争,吸引着整个剧坛的注意。吴江派领袖沈璟偏重于艺术方面,主张严守格律,恪守成式,四声阴阳、句式、用韵等等必须一丝不苟,“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他视音韵格律为戏曲创作之原则和批评之标准。沈璟要求戏曲语通俗本色,恢复元曲传统。吴江派论家指责汤显祖之“临川四梦”不谐音律,不便搬演,引起汤显祖等人的不满,起而反驳。汤显祖创作重视“意趣”,驰骋才情,不愿意拘守音律。他的创作和评论突出强调“情”在作品中的主导位置,提倡“神情合至”,要求作品中将作者的真情实感和理想境界融合起来。他把“情”与“理”的矛盾对立视为戏曲矛盾冲突的基础,对现实持

思辨批评的态度。汤显祖对戏曲的艺术特点和社会作用也有相当精到的分析论述。在论争中,臧懋循、吕天成、冯梦龙等赞同并支持沈璟的格律至上论,并对其偏激过分处有所修正补充。而王思任、孟称舜、茅元仪等人则主要阐明和发挥汤显祖的基本观点,维护“临川四梦”的公正评论,同时也汲取吴江派的合理见解。吴江临川两派的论争,使创作和批评中长期未加应有重视的一些理论问题,得到了阐述和明确,有利于戏曲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深入发展。

在吴江、临川两派的激烈论争中,双方的观点愈益明朗,彼此的缺陷和偏颇也暴露得比较充分。这为一些有识之士能权衡双方的优长得失,进行更高一个层次的评论总结创造了条件。王骥德的《曲律》堪称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王骥德认为吴江派精“法”,临川派则善“词”,但各有所偏,从而提出“法与词必两擅其极”和“剂众长于一治”的见解。他反对以偏概全的理论批评,提出了“论曲,当看其全体力量如何”的原则。又说评论一部作品必须抓住它的“大头脑”,注意它的总倾向;要注意情节结构、剪裁锻炼、针线照应;要着眼于人物形象及其曲词宾白的分析;也要严格讲究音律,善于接受文化遗产。王骥德还指出:“纯用本色,易觉寂寥;纯用文词,复伤凋镂”,本色应与文采相结合,才能相得益彰。《曲律》涉及面相当广泛,有一定系统性。徐复祚、凌濛初、祁彪佳等对吴江临川两派的优长短缺,戏曲的艺术特征、社会作用,以及批评方法等等分别发表各自的见解,为晚明曲论增添了新鲜内容。

小说批评的巨大发展

中国的小说,经过了长期的孕育和发展,到了明代,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唐人传奇式的文言短篇如《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觅灯因话》等绵延不断,源远流长,并陆续出现了不少文言中篇;新兴的白话小说更风起云涌,出现高潮。以《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四大奇书”为代表的白话长篇小说和“三言”、“二拍”等白话短篇小说的出现和流行,标志着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全盛的时期。这些小说中的许多作品,运用了高度的艺术技巧,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社会的现实,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受到了普遍的欢迎。此时,小说理论批评也随之有了巨大的发展。

明代小说批评的发展反映在许多方面。首先是批评的范围相当广泛,